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

红一方面军卷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



红一方面军卷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本册收入第三至第四部分文章 89 篇

三、通过四道封锁线

突破四道封锁线

张宗逊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撤出中央根据地，我由红军大学调任中央纵队（即第二野战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参谋长。中央纵队司令员是李维汉（即罗迈，当时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政治委员邓发（当时是中共中央保卫部部长）。军委纵队（即第一野战纵队，代号红星纵队）由叶剑英任司令员。中央纵队比军委纵队要庞杂得多，除包括党中央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以外，还有一个庞大的运输队，负责运输档案、图书和印刷厂的设备，印钞票的机器、材料、纸张以及各种设备等坛坛罐罐。中央纵队的战斗部队有张经武任师长的教导师和姚喆任团长的中央保卫团。

红军在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跨过于都河，向西南方向前进。行军时，红三军团在右翼，后面是红八军团；红一军团在左翼，后面有第九军团；就像抬轿子似的，在两翼掩护着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前进，最后面的是红五军团。

在王明路线的支配下，中央纵队完全是搬家逃跑的组织形式，根本没有做粉碎敌人“围剿”的准备。这样一个空前的大规模的行动，事先竟然不进行公开动员，使各级领导和群众思想上有所准备，而是采取严格保密的做法，只让下边做一些组织上和物质上的简单准备，到时候就

下命令行动。

我到中央纵队担任参谋长一个多星期，队伍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两三天行程时，红三军团突破广东军阀陈济棠构筑的第一道封锁线，红四师师长洪超在信丰县白石圩附近被敌军流弹击中，不幸牺牲。中央军委命令我接任红四师师长。我在红军主力通过敌人设在仁化、汝城之间的第二道封锁线以前，赶到红四师工作。红四师政治委员是黄克诚，红四师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团。

在通过敌人第二道封锁线时，红四师担任红三军团的前卫，军团命令我们打掉前进路上一个寨子的敌人碉堡，开辟通道，以保障军团主力通过，军团炮兵连连长匡裕民带一门山炮前来配合。我第一次指挥炮兵作战，没有近距离用山炮平射打碉堡的经验，由于不是在水平线上射击，接连发射两发炮弹，都没有打中目标。我们没能按命令在拂晓前打开通道，彭德怀军团长着急了，他从后面赶上来，问了一下情况，他观察了一会，指示炮兵作了调整，只用一发炮弹就击中目标，打开了通路，后续部队顺利通过第二道封锁线。

11月初，红军向敌人设在郴县、良出、宜章、乐昌之间的第三道封锁线前进。宜章县城是第三道封锁线的重要一环，红三军团以第六师附追击炮两个连和一门山炮攻击宜章城。宜章守敌只有几百人的保安团和义勇队，看见红军来进攻，吓得紧闭城门。宜章城外有300多名被强征来筑路的工人，他们热情地帮红军掘坑道，扎梯子，做攻城准备。城里敌人看见城外的情景，半夜就弃城逃跑。第二天，红六师在群众热烈欢迎下开进宜章城，红军就此通过敌人设在粤汉铁路沿线的第三道封锁线。

红军通过第三道封锁线以后，蒋介石大为震惊，亲自部署20个师，要在湘江以西堵截消灭红军。湖南和广西军阀商定以全州为界，全州以北为湖南军阀防区，全州以南为广西军阀防区。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在接近第四道封锁线时行动迟缓，延误了四天时间，

以致敌人重兵紧迫，造成非常严重的局面。

蒋介石在湘江东岸修筑了大量碉堡，他预期在湘江以东消灭红军，万一红军突过湘江以西，也不能让中央红军和四川红军或红二、六军团会合。红军决定在全州和兴安之间渡过湘江，红一军团在右翼，红三军团在左翼苦战，冒着敌机轰炸和地面敌军的火力封锁，掩护全军脱离了险境。这次强渡湘江的战役，红八军团损失惨重，溃不成军，其他军团的损失也很大。强渡湘江时，红四师在界首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渡河地段，以一天时间阻击广西敌军的进攻，掩护中央纵队通过。第二天，我率红四师两个团继续西进，红十团在湘江以西掩护军委纵队和红九军团、红五军团过江。红十团艰苦战斗了两天两夜，打退了敌人十多次冲锋，红十团团长沈述清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红四师参谋长杜宗美接任团长指挥战斗，不久也壮烈牺牲了。红十团胜利完成了掩护任务，付出了伤亡400多人的代价。以后，掩护后续部队的任务交由红五师接替。

渡过湘江之后，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多人，减到三万多人，损失过半。这都是“左”倾领导者推行错误军事路线的结果。他们一路上不愿轻装，使部队在山路上艰难前进，行动缓慢。他们不会捕捉战机，硬往敌人部署的口袋里钻，主力军团只能掩护中央纵队和新军团，不能集中全力作战。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引起广大指战员的不满和深思，特别是唤醒了高级干部的觉悟，也教训了“左”倾错误路线领导者。

红军渡过湘江以后，即进入越城岭，土名叫老山界的山区。这里山势连绵，林深叶茂，地形险峻，特别是东西向的大道较少，部队把大道让给中央纵队通过，部队多数走山地小道。红四师这时的任务仍然是掩护中央纵队行军，蒋介石的“追剿”部队被甩在后面很远，敌机有时侦察轰炸也起不了多大作用，讨厌的是广西的敌军和民团，他们经兴安和隆胜由南向北分成小股，不断地向红军侧击，增加了我军的一些困难。

红军继续前进，进入苗族同胞聚居的地区，这里的苗寨多是傍山构筑，用树皮作屋顶，竹子作架的木板房，由山脚一直连到山顶，山上风

大又无水源，如果一着火就会把整个寨子烧光。红军进入苗族地区，各级领导就教育部队防火，制定了防火措施。

但是，广西军阀为了不让红军通过，在夜间派出特工人员，到红军宿营的苗族村寨放火烧房子，企图煽动群众反对红军。有的村寨因此被烧成一片焦土，红军给群众赔偿成千的银元。这种情况，在进入贵州境内才稍有好转。

12月11日，红军攻占通道县城。中央在通道举行了会议，由于蒋介石在新宁、武冈、城步、绥宁、靖县、会同、黔阳、芷江地域部署了15个师兵力，黔军王家烈部进到锦屏、黎平地区堵截红军，湘桂军各一部继续尾追红军，企图围歼红军在北上湘西的路上。“左”倾领导者要北上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就势必进入蒋介石预设的口袋。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同志力主放弃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的正确主张得到的党和红军大部分领导的赞同。

红军根据通道会议的决定，西进贵州。旧社会称贵州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穷困地区。红军以红一军团和红九军团为右翼，经新厂、溶洞进入贵州；红三军团为左翼经团头、播阳，向黎平前进。

黎平城四面环山，敌人在这里没有修什么工事，红三军团逼近黎平，守敌不战而逃，红三军团顺利进入黎平。这样红军把敌人重兵一下子甩在湘西，敌人调整部署需要时间，红军在征战了两个月之后，第一次获得喘息机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城里召开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的主张，准备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决定把红八军团建制撤编，剩余部队分别编入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把教导师补充到各军团；把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新编的军委纵队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另外，把

庞大的挑夫队伍解散，凡能战斗的都调到战斗部队去，后方的迫击炮、炮弹和枪械也补充给作战部队。黎平会议后，红军即分两路向黔西北进军。

选自《张宗逊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124—129页。

张宗逊，1908年生，陕西渭南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入黄博军校学习，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长征时任中央纵队参谋长，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1935年起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总参谋部军训部部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中共第七届、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1998年在北京逝世。

突破四道封锁线

王平

红军在于都补充弹药和新兵，作战略大转移的准备。上级仅给我们三天时间，事情很多，我只得把电话机放在床头上躺着办公。当时是搬家式的，规定坛坛罐罐都要带上。军团命令有伤病的团营以上干部都要跟着走，不能骑马的就用担架抬，营级干部可以抬一个月，团以上干部要抬到底。我急忙派人到医院去把邓团长抬回来。

出发前，洪超师长打电话让我们派人去领枪，我向他报告说，团里每个战士都扛两条枪了，现有的枪都背不完，还领枪干什么呢。他说，你就派一个排来，能背多少就背多少。我说，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派个排去怕赶不回来。这么一说，洪超师长火了，在电话里骂起来，并说要枪毙我。黄克诚政委在他旁边把电话接过去，问清了我们的情况才算了事。洪师长当时才 25 岁，很能打仗，就是工作方法有些简单。

1934 年 10 月中旬，红三军团和中央红军各部队从于都出发，撤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当时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只听说准备转移到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未料到以后会走那么远的征程。

部队出发时，没有区分行军路线，大家只朝一个方向走，没有统一的指挥，常常是辎重和人员挤到一起抢道走。每遇到岔路口，洪师长都早早站在那里，指挥红四师的队伍通过。走了两天过了于都河，我们带

着迷惘而又沉重的心情，告别了中央苏区的人民，离开多年战斗生活的根据地，在苍茫夜色之中，走向国民党统治的地区。

刚刚离开苏区，部队的情绪很低沉，大家不时地回头张望，尤其是中下层干部和广大战士，他们许多人生在苏区，长在苏区，当兵后打仗也在苏区，留恋心情一时难消。他们边走边想，此次离开，不知开往哪里，走向何方，何时再打回来，还能不能再见到自己的父老乡亲；红军离开以后，家乡人民不知道会遭到什么样的磨难和损失，为了使大家顺利、愉快地踏上征途，我们发动党团员，边走边开展思想互助，去掉悲观失望情绪，提高革命胜利信心。

过了于都河，红军开始突围，红三军团担任右路先锋，红八军团随后；左路先锋是红一军团，红九军团随后；中间是由中央和军委机关组成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红五军团担任全军的后卫。偏偏在这时，我突然打起摆子，不得不再坐上担架。黄克诚政委在我旁边走着，他悄悄对我说，估计这次要走很远很远的路，打算第一步先到湖南。

红军向信丰地区挺进，红三军团以四师为前卫，红四师以红十团为先锋。红军前方是粤军的防区，陈济棠在赣（州）南（雄）公路沿线，修筑了三层防御工事，吹嘘为“铜墙铁壁，坚不可摧”。在准备突围之前，红军曾经通过关系和广东军阀陈济棠秘密联系，利用他和蒋介石的矛盾，声明只借路到湖南，绝不进入广东内地。通过商议，达成秘密协议，陈济棠让出40里通道让红军通过。但是陈济棠来不及通知他的前线所有部队。10月21日，当红三军团部队进到粤赣边界的时候，遇到粤军的侧击，战斗非常激烈。在兄弟部队配合下，红四师首先通过了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接着，我十一团为先锋向白石圩前进。敌军一部突然向我军侧击，企图截断我们前卫部队与后续部队的联系。洪超师长骑在马上，指挥我团将敌人击退。在此，洪师长不幸中弹牺牲，全师指战员非常悲愤，红十团跟踪追击这股敌人，我团继续前进，很快占领了白石圩。这时军委派中央纵队参谋长张宗逊接任红四师师长。

我们上午10点从白石圩出发，黄昏前到达古陂圩附近。原先侦察员报告，敌人有一个师部和一个团扼守古陂圩，我们在古陂圩河岸只遇到一个营的敌军阻击，打了一下敌人就逃到了河对岸。我们乘胜占领了古陂河左岸，与敌人隔岸对峙。第二天凌晨，我们十一团渡河发起总攻，红十团一部从左侧配合，向敌人一齐猛扑过去，守敌不堪一击，很快就放弃阵地逃跑。红十一团和红十团进占古陂圩，红十二团接替我们追击溃敌。他们一口气追了70里，一直撵到安息圩。

古陂圩是个挺热闹的集镇，也是这一线敌人的后勤基地，军衣、弹药等军用物资堆得像小山似的。从古陂圩到安息圩，一路上都是敌军丢弃的物资。这一仗，击溃了敌军一个团，我们伤亡不大，全军每人分到两身新军衣，补充了许多弹药。

打扫战场以后，红十一团到古陂圩外休息。我和警卫班在一个小山坡上睡觉，警卫班在山坡上，我在山坡下，不料班里一个战士的枪走火，把睡在我上边的班长打死了。子弹从他的身体穿过，又贴着我的耳朵上边飞去，这又是一次生命危险。

红三军团接着前出到坪石，在这一带渡过信丰河，占领了大江圩、小河、王庄一线，经九渡水向梅岭关前进。至此，中央红军全部通过了敌军第一道封锁线。这时，粤军边打边撤，我们按照上级通知，不追击、不俘虏他们的官兵。

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突围之后，命令“围剿”中央苏区的西路军和南路军在桂东、汝城、城口、仁化一带构筑第二道封锁线。红三军团进占崇义县城以后，由稳下、左溪、关田、文英、热水向汝城前进。红十一团仍然担任师的前卫。11月初，我们进到热水圩，这是由江西进入湖南的必经之路。我们在山上居高临下观察热水圩，敌人连个瞭望哨也没设置。这天恰逢圩日，街上人声鼎沸。我们从山上下来走到街头，才发现圩里的民团，用机关枪一打，他们就四处逃窜了。热水圩没有国民党军队，只有民团百来个人，部队很顺利地通过了。

第二天拂晓，红三军团命令四师攻击汝城。但是打了一下，发现汝城城堡坚固，有两个团的兵力扼守，我们不宜在这儿恋战，便决定放弃攻击汝城，以一部分部队监视敌人，其余绕道通过。军团命令红十一团，在第二天天亮前，打下汝城以南大耒圩附近的一个寨子，为全军打开一条通道。

我们赶到这个寨子跟前，寨子四周有四座炮楼，前边布满鹿砦。我命令第二营负责先破鹿砦，然后发起攻击。等了一会儿，前方没有动静，我赶到前边一看，二营在前沿上趴着，不少人睡着了。我找到二营营长，问他为什么迟迟不动，他说烧鹿砦的煤油没有送来。其实他根本没派人去领，我命令他立即发起攻击。二营打了一会，没能攻下来，天已近拂晓了。这时师里把军团派来的一门山炮调上来，由张宗逊师长指挥打炮。他讲这门炮只能打600米，在后面距离远打不准，要尽量靠前，等炮兵把炮移到前面的时候，他又说太近了，这样移来移去，天已大亮。

彭德怀军团长听不到前边部队的动静，焦灼不安地骂着从后面赶上来，见我就问：“为什么还不发起冲击？”没等我回答，他一眼看到山炮架得太靠前，更加生气了，“哪个把炮架在这里？”一时没有一个人吭气。等到重新调整好炮位，太阳已经出来。彭军团长下令射击，只一发炮弹就把前后两个炮楼都穿透了，其余两个炮楼的敌人也全吓跑了。这条通道冲开后，红三军团大部队很快从这里通过。此时，彭军团长很高兴，他对我说，红十一团已经一整夜没有睡觉了，可以就地休息一下，然后到广东城口方向接替红一军团三团担任警戒。我们团稍事休息，即赶到指定地点，接替黄永胜的红三团，掩护红一军团从汝城和城口之间通过。中央红军又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继续在湖南境内西进。

11月初，红军向郴县、良田、宜章、乐昌之间前进，通过国民党军队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这时秋雨淅沥，下个不停，道路都成了泥浆，走一步滑半步，草鞋变成了泥坨子，经常被粘掉，队伍拉得很远，掉队的人逐渐增多。师政委黄克诚随我团行军，他是深度近视，夜行军怕摔

跤把眼镜弄坏了，就把眼镜摘下放在口袋里，由警卫员用根小木棍拉着他走。有时我和他一起走，我装作过沟的样子跳一下，他也跟着跳一下，跳了几次，他才发觉我和他开玩笑，骂我“捣蛋鬼”。红三军团前出到资兴，打开三都，路过黄克诚政委家乡永兴县油麻圩附近，黄政委离家十来年了，他深情地望了望家乡，向带路的老乡问了问老家的情况就走过去了。

宜章没有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只有民团、“义勇军”据守，总共不过几百人。军团决定攻取宜章。红六师以十六团为先锋，冒着大雨奔袭宜章，在距离宜章 15 公里的白石渡，遇到 200 来人的民团抵抗，红军一打他们就全部逃跑了。红军直抵宜章城下，城里的民团吓得紧闭城门。红六师准备攻城的时候，城郊的劳苦大众和在这附近修筑铁路的工人都来帮助红军挖坑道、扎云梯。城里的敌人看着城外的阵势，吓得不敢再待下去，半夜里弃城逃跑了。天亮以后，城里群众大开城门欢迎红军，宜章不攻自破。

红三军团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受到中革军委的通令表彰，称赞军团全体指战员的“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占领宜章以后，红三军团在良田、宜章之间，掩护红一军团通过粤汉铁路和第三道封锁线。

11 月中旬，红军为了迅速秘密地脱离尾追的敌人，前进到临武、蓝山、嘉禾地区。红三军团途经嘉禾，打了一下，没有打开，遂由清水圩、土桥圩等地进到洪观圩。从此，红军进入湘桂交界的九嶷山区。

红军远离根据地以后，天天行军打仗，极度疲劳。部队在弯曲的山道上蜿蜒盘行，既要对付国民党军队的堵截、侧击、尾追和飞机的轰炸扫射，又要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的庞大队伍，像抬轿子式的，行动异常迟缓艰难。机关纵队从苏区带出来的大量辎重装备仍然挑着，坛坛罐罐也舍不得扔掉，连印刷机、印刷纸张、野战医院的 X 光机甚至屎尿盆都带着，部队一天能走完的路，陪着这样臃肿庞大的机关就得走两天甚至三天。当时的情况，正如毛泽东同志讲的，像是叫花子打狗，

边打边走。部队掉队的越来越多，收容队根本没法收容。掉队的人员一天赶不上，以后也就永远赶不上了。每到宿营地，指挥员刚发出休息的口令，战士们随地一躺就睡着了，到出发时间干部们大叫大嚷也喊不起来。有的干部有时急得没法子，就用打枪高喊“敌人来了”的办法，把战士们轰起来。晚上行军速度更慢，挑夫班有时走一晚上才走出四五里路。

红军突破了敌军三道封锁线，蒋介石十分焦急，急忙成立“追剿军”总司令部，企图在湘江以东围歼红军。

湘江江宽水急，由南向北流经湖南全省，注入洞庭湖。湘江是敌人“追剿”红军必然利用的天然屏障，也是红军西进必越的障碍。蒋介石的“追剿军”总司令官何键，部署16个师的兵力负责“追剿”红军，以五个师的兵力在前边堵截，在湘江东岸利用地形修筑了100多个大小碉堡，设置第四道封锁线。但是敌军阵营中派系斗争严重，尔虞我诈，互相掣肘，部队集中并不很快。红军要免遭大的伤亡，必须抓紧时间，在敌人形成封锁线之前抢渡湘江。

红军越往前走，形势越险恶。当红三军团走到宁远附近的天堂圩时，上级命令我们红十一团单独向宁远方向牵制敌人。宁远方向粤军余汉谋的部队番号是第四师，我们也是第四师，相隔只有八里地，但是互相都没有发觉。一天夜里，我们的电话兵把电话接到敌人的电话线上，互相一通话，都自称是第四师，才发现敌人已经上来了。敌人是一个师，我们是一个团，只好停止前进监视敌人。这时师部一个参谋骑着师长的马赶来，通知我们马上转回去，要在40里外的一座山上围歼敌人。

我们经过一夜急行军，在天亮前赶到指定地点，那天起了浓雾，朦朦胧胧看到两边山上有人活动，那个参谋说这边是红十团，那边是红十二团，他们已经进入预定阵地了。可是，山上响起号音，司号长一听，觉得不对头，告诉我山上是敌人。我立即命令部队停止行动，压低一切声响，暂时隐蔽起来。

原来是军团突然改变了计划，决定这一仗不打了，主力已经撤离。这样我团正处在两个山头之间，陷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山上的敌人也发现山沟里有人，但在雾里看不清楚，他们先打了几枪。我们灵机一动，向他们喊话，骂他们瞎眼了。因为都是南方口音，敌人以为是自己人也就不打枪了。这一带是邓国清团长的家乡。部队到这里以后，他思想有点动摇，突然病倒了，我找担架把他抬上，让特派员陪着他，叫他们先走。然后下令部队迅速撤走。刚走出山外，正巧遇着师部的通信员，他传达了张师长的命令，让我们赶快向南撤。红十二团团长沙嵩带着一个营，在前边迎接我们团，掩护我团全部通过以后，他们跟着撤走。我们和师部会合以后，我把邓团长的思想情况向师里作了汇报。

红三军团占领道县、江华，渡过潇水，准备在广西全州、兴安之间抢渡湘江。红四师奉命归红一军团指挥，进击全州。敌薛岳纵队和湘军共三个师先于红军赶到全州，并已经构筑了工事，当红一军团第一、第二师赶到全州后，敌人在飞机和炮火掩护下全线出击，被红一军团一一击退。一军团感到在全州坚持下去对我不利，便撤出战斗。

红四师主力随一军团在全州和灌阳之间的界首渡口强渡湘江。过湘江西岸以后，红十一团奉命轻装向桂林方向佯攻。师部指挥红十团在湘江西岸的光华铺阻击白崇禧部队的侧击，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纵队、军委纵队通过。白崇禧部队以数倍于红十团的兵力，向红十团阵地连续发起冲锋，在一日之内，团长沈述清牺牲，师参谋长杜中美接任团长又牺牲，可见战斗激烈之程度。红十团政委杨勇指挥部队苦战两天两夜，完成了控制界首以南渡口，掩护军委纵队和红九军团渡过湘江，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的任务。这一仗红十团伤亡400多人。红十一团完成佯攻任务后随师行动。

红三军团率五师和六师向灌阳方向攻击，红五师在新圩以两个团阻击敌人三个师，他们坚决执行中革军委“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四夜”的命令，与敌人拼搏，与阵地共存亡。红五师伤亡2000多人，

师参谋长胡浚牺牲，红十四团除政委谢振华外，其余团的干部都英勇牺牲。中央纵队和主力过江以后，红五师才撤出战斗，向西转移。阻击任务交给红六师。红六师十八团担任掩护红八军团渡江的任务。三军团从湘江上游灵渠分洪处过江。红十八团与敌两个师又一个团浴血奋战几昼夜，终于完成了任务。全团指战员大部壮烈牺牲。

担任后卫最后掩护部队，除十八团外，还有红五军团三十四师，他们在湘江以东阻击敌周浑元的三个师和白崇禧的三个师，最后被敌人隔断包围未能过江，全师战至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师政委程翠林战死，师长陈树湘受重伤后被俘，在押解途中，他自己用手从腹部伤口把肠子拉断，英勇献身。

红军各部队冲破数倍于己的敌人的尾追堵截，胜利渡过湘江，靠的是各军团的正确领导和各师团指挥员的正确指挥，广大指战员的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否则是难以想象的。

渡过湘江以后，中央红军已从长征开始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为三万余人。这是“左”倾军事路线造成的恶果。沉痛的教训，引起了红军广大指战员对中央错误领导的不满，部队中要求改换中央领导的议论逐渐增多。

选自《王平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63—73页。

王平，曾用名王明，1907年生，湖北阳新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长征时任红三军团四师十一团政治委员，1936年2月调任红一军团第四师政治部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北军区副参谋长、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等职。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98年在北京逝世。